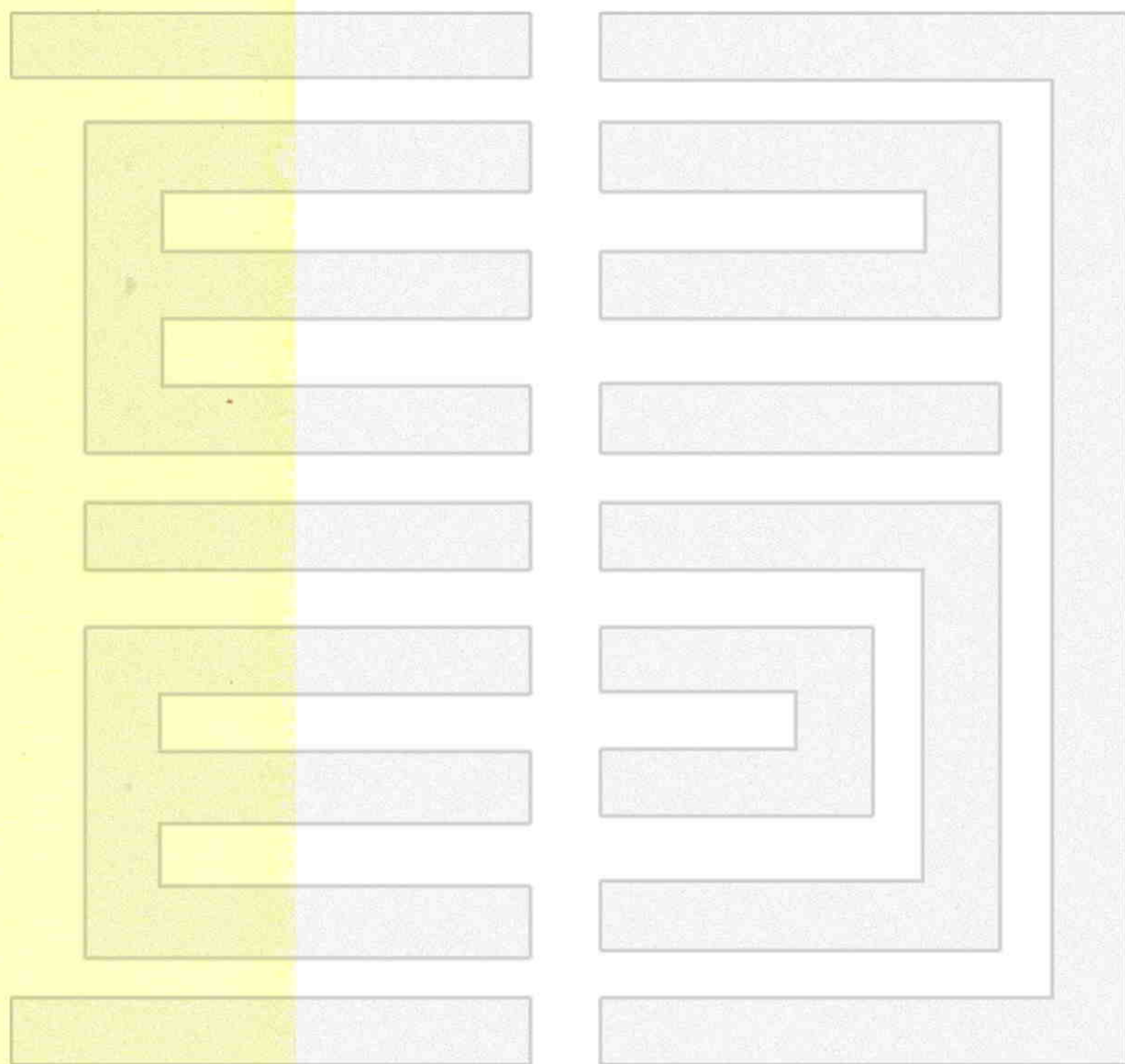


新疆作家作品论

封面设计 李安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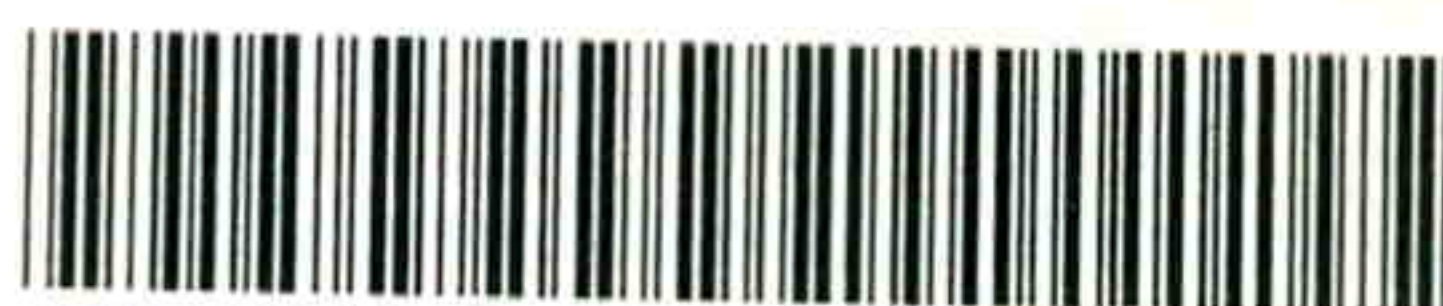


I206.7
(W)5

0078622

新疆作家作品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XT0-0078622

564209

此书承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新闻出版处、上海出版
局、上海中华印刷厂大力帮助,谨此致以谢意。

新疆作家作品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 编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乌鲁木齐市解放路306号)

新疆新华书店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9.75印张 2插页 250千字

1985年8月第1版 1985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0

统一书号: 10098·206 定价: 2.30元

目 录

前言.....编者（1）

诗与良心和生命浑然一体.....张 越（1）

——再谈铁依甫江的诗歌创作

克里木·霍加诗歌艺术探微.....陈柏中（12）

唱出时代的歌声.....王 堡（23）

——论艾勒坎木的抒情诗

维吾尔族优秀诗人尼米希依提.....丁子人（43）

试论祖农·哈迪尔的戏剧和小说创作陈柏中 秦俊武（60）

春雨后，煞是一番新绿.....丁子人（71）

——谈祖尔东的小说近作

高吟肺腑走风雷.....刘 宾（82）

——读柯尤慕的长篇小说《战斗的年代》

创造性追求的一个侧影.....陈柏中（91）

——评王蒙反映兄弟民族生活的短篇小说

王玉胡电影剧本创作的贡献与特色.....雷茂奎（103）

激情与感奋的流泻.....雷茂奎（114）

——读《从天山脚下开始》

他写出了诗，诗写出了他.....王仲明（121）

——中年诗人杨牧论

评章德益诗歌的思想艺术特色.....郑兴富（134）

周涛诗艺管窥：超越具象.....周政保（152）

朱定叙论.....陈 艰（165）

作家邓普的创作道路·····	余开伟 (176)
周非长篇小说的创作风格·····	黄 川 (186)
为冰山塑像·····	常 征 (199)
——评唐栋近作的思想底蕴与艺术特色	
试论许特生小说创作的民族特色·····	余开伟 (209)
英雄的写照、将军的赞歌·····	刘有华 (222)
——评安静的《将军塞上曲》	
感情艺术的创造及其他·····	丁子人 (230)
——简论库尔班阿里的长诗《她的梦幻与现实》	
牧家风情入画图 ·····	王堡 阿吾里汗 (241)
——谈夏侃的诗	
郝斯力汗和他的小说创作·····	张 越 (251)
艾克拜尔·米吉提的小说艺术·····	周政保 (268)
努力塑造当代农牧民的文学形象·····	邓美萱 (282)
——谈乌拉孜汗的短篇小说	
塞外回乡风情录·····	汪宗元 (290)
——漫谈白练的短篇小说	
郭基南诗作的思想艺术特色·····	邓美萱 (298)

前 言

这本当代文学评论集，论述了解放后活跃在祖国西部的新疆各民族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作家的创作，比较细致地分析了他们创作的成就、特色、成长道路及在新疆社会主义文学中的地位与影响，有的论文还兼及一些创作中的理论问题。然而，由于我们编辑这本书的初衷，是侧重在检视解放后我区创作的成果，向全国人民介绍新疆各民族的作家，因此那些有关新疆文学创作中特殊的理论问题，都未得到深入地探讨；而新疆各民族的作家又是如此众多，尤其是近年来，涌现了不少很有特色的、很活跃的中青年作家，而我们这本书的篇幅有限，不能论及面太广，实为憾事。这些，留待以后再编再论吧！

新疆文学是我国多民族文学的组成部分。解放后的新疆各少数民族文学，一方面在继承和发扬本民族文学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前进，一方面在越来越明显地接受我国汉族文学、其它兄弟民族文学以及外国文学的影响而不断丰富、发展和提高；而新疆汉族文学，由于产生于这个边疆的多民族地区，必然也显示了与内地汉族文学有所不同的特点。正是新疆生活的特殊性，给新疆文学带来了与全国文学迥异的宝贵的特色，这个特色，使它在全国文学大花园中占据了自己应有的位置；而随着新疆文学创作力量的逐渐增强，创作水平的逐渐提高，新疆文学在全国的影响也在进一步扩大。近年来，新疆作家的创作数次在全国获奖，新边塞诗派在我国诗坛上的引人注目，很能说明问题。我们相信，随着开发祖国大西北步伐的加快，随着新疆各民族作家的迅速成长，新疆文学将会越来越显示他在我国文学中的重要性。

近来,在开发大西北、开发新疆的浪潮推动下,“西部文学”的呼声很高。西部文学在崛起,西部文学要腾飞,这是令人振奋的。然而,西部文学并不是今天才突然出现在地平线上的,它有长期孕育和发展的过程,也有新的时代的标记。我们认为,从一定意义上说,我们这个集子中所论述的作家及其创作,都是西部文学的组成部分。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已经透视出、并将更深入地总结出西部文学的某些本质特点。我们今天提倡西部文学,就必须在总结他们创作经验的基础上,进行更自觉的、更大胆的艺术追求,从而把西部文学创作推上一个崭新的高峰,走向更加成熟、更加富有时代特征的新阶段。

这本书是继一九八二年《新疆兄弟民族文学评论集》之后,第二本新疆文学评论集。这本集子的作者和所论及的作家,都比前一本扩大了,由此也可以看出新疆文学事业发展的一个侧影。我们相信,随着文艺创作和文艺评论自由权利的获得,新疆的文学事业会有更快更大的发展,文学创作和评论的迅速提高、突破,也是可以预期的。

本书由文艺理论研究室的张越,浩明同志负责组稿和编选工作。由于我们水平有限,时间短促,编辑工作一定存在不少缺点,万望广大读者和文艺工作者批评指正。

编 者

1985年2月

诗与良心和生命浑然一体

——再谈铁依甫江的诗歌创作

张 越

一九六二年，维吾尔族著名诗人铁依甫江在一首《柔巴依》^①中写道：

我写诗，不是出于兴趣，
对于我，诗与良心和生命浑然一体。

这两句诗，是对诗人创作道路、生活道路和人生观的富有哲理而又形象的概括。写出这两句诗时，他已经历了十五、六年的创作生涯，写了许多好诗，而且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十年浩劫期间，他为了诗，为了诗的良心——人生的态度，遭受了诬陷与迫害，几乎丧命。因此，这两句诗可以成为理解他的全部创作的要旨，是开启他创作密室的钥匙，探寻他诗歌幽微的火烛。

现实生活是诗歌赖以生存的天地

高尔基曾经说过：“真正的诗，永远是心灵的诗，永远是灵魂的歌。”^②这话是十分正确的。但是这种诗歌，是脱离客观现实的纯“自我表现”，还是客观世界在诗人头脑中反映的产物，自古以来，就有截然相反的认识。时至今日，在我国八十年代的诗坛上，仍是争论不休的大题目。对这个问题，铁依甫江有清楚的，一贯的认

识。早在五十年代，他就反驳过“写诗不需要体验生活”的错误说法，他说：“真正的诗，不决定于诗的形式，而决定于其内容。也就是说，影响诗人的是生活，不是别的。诗人是根据从生活中吸取的素材和作出的结论进行构思的，并以此通过诗的形式表现出来。”^③八十年代，他更深入准确地概括了自己的认识：“诗歌的母亲就是现实生活……现实生活是诗歌赖以生存的天地，诗歌是在这个天地里萌芽生长的。”^④

铁依甫江的这种认识和主张，是对自己的现实主义的诗歌创作经验的正确总结，是符合马列主义的唯物主义反映论的，他也是遵循自己的这个主张从事诗歌创作的。他创作历程近四十年，写作诗歌近千首，反映的生活面之广阔，展观的社会内容之丰富，可称当代维吾尔族诗人之冠。离开了生活源泉，能取得如此丰硕的收获，是难以想象的。解放初期，他生活在风云激荡的农村减租反霸和土地改革的斗争漩涡中，深深地体验了广大贫苦农民的欢乐与痛苦，他写出了《起来吧，农民》、《控诉》等诗歌，博得了全疆农民的欢迎与信任，被谱成歌曲，成为农民们向封建地主阶级冲击的战斗进行曲；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七年，当一些民族分裂主义者策划建立“维吾尔斯坦”的阴谋活动时，他创作了《祖国》、《心里的话》等诗，抒发了对祖国的深挚感情，批驳了民族分裂主义谬论，起了明显的战斗作用；在浮夸风弥漫祖国上空的年代，他孕育了《“基本”的控诉》这样的佳作，历数了吹牛撒谎之风给国家、民族造成的灾难；在风云变幻、祖国西部边陲动荡不宁的六十年代初期，他创作了《祖国，我生命的土壤》、《老战士的嘱咐》等优秀的爱国主义诗章，抒发了诗人强烈的爱国情怀和对青年后代的期望，激励了人民的革命意志；而当祖国迎来了第二个春天，诗人在多年沉默搁笔之后，又象经过严冬的百灵鸟一样，流着眼泪欢唱美好的春光，写下了《春的启示》、《春日里的热泪》、《三十年》、《如果》、《过去与未来》、《故乡抒怀》等一系列诗篇，表达了我国人民经过劫难后的欢乐与思考。此后，他的足迹踏遍了天山南北的广阔农村牧场——

吐鲁番盆地的葡萄之乡、伊犁河畔的瓜果之乡、塔里木河两岸的稻谷之乡、昆仑山下的丝绸之乡、阿勒泰山下的草原牧场……新时期各族人民拨乱反正、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为诗人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创作素材，也不断激发着诗人的灵感，他写出了一组组清新优美，富有深度的诗篇，呈献在广大读者面前。

了解了现实，为写诗提供了素材，而要写出好诗，这还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其它条件，这些条件，除去写诗的技巧之外，最主要的，是诗人对待生活的态度，对生活的主人——广大人民群众的态度。诗人曾说：“作人民的歌手是我最强烈的愿望。”^⑤他以人民的爱憎是非为自己观察、分析事物的准绳，以此来撷取生活，提炼生活，将人民心声化作诗章。比如诗人曾谈过他创作《庄稼人的真心话》组诗的情形。在诗前《题记》中，他写道：

一九八〇年初，我到吐鲁番、鲁克沁一带农村去，见到社员们正在批判极左思潮，他们说：“我们现在敢于说真话了，不知诗人们是否也敢于反映我们真实的心声？”我这里记下的，不过是他们的原话而已。

这有力地证明，铁依甫江的诗，是在生活中汲取素材、语言、形象，又以人民的感情来熔铸加工创作出来的。诗人曾经更具体地谈过他创作《父亲的叮咛》的过程：有一天，他参加一个农村生产队的会议，一个小伙子被社员选为生产队长。这时，小伙子的父亲站起来说话了：“孩子，大伙儿信任你，才选你当干部的。从此，这个生产队就由你管啦！但是，我有一句话要告诉你：‘当干部就要作人民的扫帚，可不能高高在上啊！’”听了老父亲的话，诗人眼前浮现出一把扫帚的形象，并在日记中记下了最初的感想：“扫帚是一种劳动工具，人们生活的必需品，它可以扫除室内院里的垃圾。但是，它并不因为自己有功而去争名夺利，而甘愿默默无闻地为主人服务。”^⑥后来，诗人根据这一思想，创作了一首很有深度的小诗：

人民今天选你当干部，
你是人民的儿子，这点可得记牢。
只能给人民当扫帚，不能当老爷，
我这话，你好好去咀嚼咀嚼。
扫帚清除污秽，使人民生活得舒适，
但从不高踞上座，只悄悄伫立在壁角。

现实生活是诗歌赖以生存的天地，诗人对这一理论命题的概括是完全正确的。

诚实和勇敢是诗歌必备的属性^⑦

既明确诗歌来源于现实生活，又决心作一个人民的歌手，用诗歌替人民说话，那么诗人是如何看待生活与表现生活的呢？

诗人在解放后的若干年内，深深体验了解放给人民群众带来的喜悦与幸福，看到社会主义祖国日新月异、蒸蒸日上的变化，他自己也在党的关怀下处在顺境之中，从内心深处不断产生要歌颂社会主义新生活的创作冲动；加之对党的文艺政策、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学习，苏联社会主义文学对他的影响，尤其是一九五七年初周恩来总理接见他时谆谆教诲的话：“好好歌唱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好好歌唱各族人民的亲密团结”，使他终生难忘。^⑧这就使他从理论上懂得，应该热情歌颂人民，歌颂社会主义。后来，他回忆文化大革命前的创作时说：“我当时认为社会主义文学的特点就是歌颂。”^⑨因此，他的大部分诗，可以说是歌颂的诗——他歌颂祖国，歌颂社会主义，歌颂党，歌颂领袖，歌颂民族团结，歌颂工人、农民，歌颂劳动、爱情，因而他的诗，尤其是五十年代的诗，洋溢着明朗、欢快、单纯、热烈的情绪，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和社会主义祖国年轻美好的形象。

虽然如此，铁依甫江绝不是那种只会唱赞歌的诗人。他的目

光注视着现实，现实也赋予他一双慧眼，使他不仅能看到生活中的光明与美好这一主流，也看到社会的阴暗面。他曾在一九五六年创作的《祖国》一诗中写道：“是您教会了我识别善恶，懂得了美丑，大小与真假。”他曾说：“在社会上还存在着阴暗面，存在着使人作呕和厌恶的社会渣滓。这是我们前进的绊脚石。对它视而不见，不揭发，不批评，实际上就是对社会不负责任。”^⑩诗人使用维吾尔人民喜闻乐见的幽默、讽刺的手法，创作讽刺诗。他的讽刺之作，虽然数量不是很多，但却写得很出色，刺向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弊端——那些不务实际、夸夸其谈的空头政治家、那些违法乱纪的干部、那些吹牛撒谎、危害人民的官僚主义者……这些诗，在当时，无疑是一副清凉剂，它提醒党和人民，不要视而不见，不要漠然置之。这些诗，和他的歌颂一样，是从诗人的良心——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的赤胆忠心 and 高度责任感出发创作出来的，是从诚实的心灵中流溢出来的，是诗与良心交融的结果，是人民群众爱憎感情的披露。尽管诗人为此而遭到了非难，甚至成为他的“罪状”，使他遭受了种种磨难与屈辱，然而这位认定“诗与良心和生命浑然一体”的诗人，一旦“生命”复苏，良心不泯，又要写诗，又要歌颂，又要讽刺，而且增加了勇气，以更强烈的感情来歌颂，以更深沉的愤慨来揭露。这种歌颂与讽刺并行不悖的传统，是铁依甫江创作道路中一个明显的特色，是他忠实于生活、全面地反映现实生活的表现，是他坚持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表现，也是他以诚实和勇敢的精神抒发人民心声的表现。直到粉碎“四人帮”的这数年，他仍然手持这两种武器，既歌颂，也讽刺。纵观他的全部创作，总是以歌颂为主，数量也多，表现了诗人对祖国、对人民、对社会主义事业和美好事物的热爱与忠诚；以讽刺辅之，数量较少，体现了诗人对丑恶事物的指斥和对错误路线的抵制。

为人民而诚实地放声歌唱

铁依甫江的歌颂诗，是他“为人民而诚实地放声歌颂”^⑩的记录，主要是抒情诗和爱情诗，这两类诗占他诗歌创作的绝大部分，产生过不少受人民喜爱的优秀之作。

抒情诗，抒发了诗人的也是人民群众的欢乐与忧愁，许多诗带着浓厚的政治色彩，反映着国家和人民生活中的重大政治事件，如新疆的解放，农村的土地改革，抗美援朝运动，中苏友好，维护祖国和平统一的斗争，祖国第二个春天的到来，拨乱反正的历史潮流，四化建设中的新生事物，乃至铁路修到乌鲁木齐、纪念反“四人帮”的革命烈士等等，都在他的诗歌中得到了反映。诗人的歌吟是和着我们时代前进的步伐的，是时代的回声。铁依甫江的可贵之处，正在于他对国家的大事、人民的大事有高度的政治热情。这使得他获得了成功。如新疆解放时他写的歌词：“怀抱红日的黎明来了，/沉重的夜色倏然消退；/穷苦人自豪的日子来了，/祖国啊，笑得满脸光辉。/呵哈——/我们洒下的鲜血已化作含苞的玫瑰。”红日、黎明、笑脸、玫瑰，把当时人民欢乐、自豪的情绪写得十分集中饱满；再如有的诗表现了执着的祖国之恋，如一首《柔巴依》中写的：“如果艾沙圣人真的住在天上，/而且天堂还将为我开放；/那天堂的欢乐只是毒饵，/因为离开祖国我不如死亡。”诗中所抒发的对祖国的感情，那么深沉、执着、强烈、汹涌。粉碎“四人帮”后，他歌颂“永生的烈士”张志新“在最无耻的刑罚面前你傲然挺立，/你不屈的勇气惊呆了那些卑微的灵魂；/历史赋予了你一副钢铸的灵魂/你是我们时代真正的女神。”而且在歌颂张志新的同时，一针见血地戳穿了“四人帮”的本质：“你的‘罪恶’正是发现了罪恶，/你指出了仙女本是妖魔。”表达了亿万人民对社会主义时期革命烈士的无限敬仰和对“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深仇大恨。在“四·五”运动三周年那天，他又怀着深沉的敬爱之情，写了一首诗《难忘的春宵》，

回忆和歌颂我们敬爱的周总理：

每当春暖花开的季节，
我更抑制不住对您的怀念；
您的亲切的教诲，
是催芽的春雨，拔节的阳光。

形象地表达了“周总理永远活在人民心中”这一主题。

诚然，在铁依甫江的抒情诗中，有不少带着明显的时代局限。例如，许多歌颂党、歌颂社会主义的诗，实际上成为歌颂个人崇拜、现代迷信；再如，有不少歌颂政治运动或以诗作“武器”参加战斗的诗，显然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因而这些诗歌缺乏思想深度，浮泛浅露，冗长拖沓，标语口号化，经不起时代的考验筛选，已被人淡忘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照亮的诗人的心，照亮了他的诗歌创作之路，使他的思想境界得到了升华，他的创作思想更加正确和成熟。反映在他的诗歌创作中，纯粹的、单色调的歌颂诗很少了，代之以歌颂与反思潮结合的复色调的抒情诗，使他的诗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深厚的历史感相结合的特色。

爱情诗。这是铁依甫江诗歌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五十年代，他写了许多很好的爱情诗。铁依甫江的这类诗，一般都比较短小精炼，有独特的构思意境，感情真挚细腻，娓娓动人。有的表达了在劳动中建立爱情或以劳动的好坏作为选择爱人标准的恋爱观，有的体现了要求互相尊重、男女平等的爱情追求，而更多的是对爱情本身的歌颂。如《苹果》：

请收下我送别的礼物，
将这枚苹果揣在怀里。
思念时就闻闻它吧，

权当我伴随着你。

别以为你是只身远去，

相隔着关山迢递。

伴你同去的还有，

我满腔的柔情蜜意。

把一对恋人临别时的温情脉脉、难分难舍，而为了事业又毅然分手的感情描绘得细腻而有诗意。《第一封信》写妻子对丈夫的爱，通过学了文化，会写信一事，表述得极富有生活的情趣。《思念》把相思之苦、爱恋之深描绘得绝妙之至，生动传神；《唱不完的歌》通过一个简单的故事勾勒，创造一个如痴如醉的热恋的艺术氛围，诗意盎然，耐人寻味。《我把你的咀唇比作葡萄》，把火热的恋情通过形象而又贴切的比喻抒写出来，使这首散发着浓郁的民族特色的诗与诗中所歌颂的爱情，都象吐鲁番的葡萄一样，那么甜美，那么诱人！

近年来，铁依甫江又写了不少爱情诗，而且同样博得了好评。象那包括《我珍惜你的爱情》、《姑娘的忧伤》和《春日里的热泪》三首诗的《爱情篇》，还获得了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一等奖。除此而外，他还有一组十八首《格则勒》，^⑫全部是爱情诗。这些爱情诗也和他的抒情诗一样，与五、六十年代的风格迥然不同：过去所抒写的，多数是单纯而火热的恋情，犹如清澈的泉水，明净透亮，伴着青春的笑语和幽默的情趣；而今所抒发的爱情，内容和色彩都要复杂得多，深沉得多。比如，他歌颂那经过“强暴的威逼”而能“痛斥诬陷”的坚贞的爱情，歌颂那“不为彩礼诱惑，不怕亲人诅咒”的纯真的爱情，歌颂那“同在科学高空飞翔，同攀文明高峰”的志同道合的爱情，抒写那生离死别、历经社会风云的爱的思念，谴责爱情中的轻佻、负心、虚伪、贪欲、商人气息、低级趣味……这些爱情诗，虽然也有许多欢乐、喜悦，但更多的是和眼泪、忧伤、悔恨、斥责交融在一起，不是单纯表达青年男女的情爱，而是诗人用以对我们社

会的爱情生活发言的一种艺术方式，一种抒情的方式。

讽刺好比骆驼刺，既有刺、又含糖

铁依甫江写讽刺诗，是以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去表现现实的一个方面。他曾说：“讽刺是反映现实生活的产物，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值得嘲笑的污垢……它使用的都是幽默、责备和嘲笑的语言。”^⑬这段话表明了诗人写作讽刺诗的动机和所使用的方法，对于我们认识他的讽刺诗作，有重要意义。

解放初期，诗人虽然还只是二十来岁的青年，但对社会却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他一方面欢呼祖国黎明的到来，一方面又在《以革命的名义宣告》中，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崇尚清谈者”、“装腔作势者”、“耍弄花招的里手”、“危言耸听的演说家”、“好吃懒作的寄生虫”、“惰怠成性的二流子”、“满身疥癩的变色龙”、“口蜜腹剑的坏蛋”等社会蛀虫的活动，警惕“狐狸似的家伙”搞“乱中偷攘”的把戏，警惕我们队伍中的敌人窥测时机，葬送我们的幸福……这说明，诗人在欢呼解放的时代潮流中，并未被胜利冲昏头脑，把一切看得如朝霞般美好。他的眼睛还盯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渣滓和不良习气。他的讽刺诗就是针对着这些社会积弊而发的。

写于一九五五年的《报告迷之死》，通过夸张的艺术处理，提炼了几个看似荒唐、实则典型的情节，把一个高居于人民之上，喜爱玩弄革命词藻，夸夸其谈，不顾人民疾苦，危害革命事业的空头政治家的可笑可憎的形象，刻画得惟妙惟肖。这首诗，在令人捧腹的笑声中，产生了强烈的鞭笞的效果。诗人一九六二年写的讽刺诗《“基本”的控诉》，用拟人化的手法，让“基本”这一形象现身说法，原原本本地历数他所亲历的事情——他被人利用当作吹牛撒谎、造谣欺骗的挡箭牌和遮羞布所干下的恶劣行为，及对人民所造成的严重灾难。这首诗不采用夸张，而采用“集中”的典型化手法，诗中列举的事情都是人们司空见惯的，诗人将它用一个人（基本）的